



四年《世界年鉴》，随园食单》书影
由张謇题端的“一九一”
清代文学家袁枚像。
随园主人袁枚像。

酥鲫鱼:袁枚点赞、登上国宴的南通名菜

□何美红

南通地理位置优越，水产资源丰富，尤以江、海、河三鲜俱全而独具特色。其中的鲫鱼，肉质鲜嫩，为淡水鱼中的上品，且产量颇丰，四季可取，不仅为南通百姓日常食用、最爱吃的一种河鱼，还由于其谐音带来的好口彩等原因，成为人们传统待客、节庆宴席及建房上梁、祭祖等民俗仪式的常用鱼类。

关于吃鱼，南通人有“冬鲫夏蟹”的说法，盖因鲫鱼“冬月肉丰而多子”，味尤鲜美。查南通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通城《饮食同业公会公议价目》表中的菜单，排在鱼类菜品之首的就是鲫鱼，并且有“烧鲫鱼、荷包鲫鱼、干烧鲫鱼、溜鲫鱼、清蒸鲫鱼、余鲫鱼、芙蓉鲫鱼”等多种烹制方法，带给食客不同的风味和口感。眼下又是食用鲫鱼的最佳时节，但鲜为人知的是，有一道出自南通的“酥鲫鱼”，曾是食界无人不夸、引得袁枚点赞的名菜。

据2000年版《南通市志》载，南通在“宋代，烹饪技艺即有独到之处”，“酥鲫鱼”名传各地。另有清乾隆年间文学家袁枚的餐饮专著《随园食单》，精彩记录了明清几百年间的流行美食，是一本被清代食客推崇备至的“吃货指南”。在该书“水族有鲜片”关于“鲫鱼”的食单中，就有“通州人能煨之，骨尾俱酥，号酥鱼，利小儿食”等句。此处的通州即指南通州。

另一本清代烹饪专著《调鼎集》则在引用袁枚点赞文字的基础上，又介

绍了“酥鲫鱼”的两种做法：“大鲫鱼十斤洗净，锅内用葱一层，加香油与葱半斤、酒二斤、酱油一斤、姜四大片、盐四两，将鱼逐层铺上，盖锅封口，烧数滚，掣去大（疑为火字），点灯一盏，燃着锅脐烧一夜，次日可用。又，剖后不见水，用酱油浸七日，沥净晒干，剪去划水、及麻油熬滚，次第入油炸枯，乘熟洒椒末装罐（疑为罐字），半月可开。”

从现有餐饮史料可见，以上两种做法以前一种为主。1914年《世界年鉴》中也有关于这道名菜的菜谱：“用砂锅一只，底上铺大葱一层，再将洗刷洁净之小鲫鱼铺于葱上，复铺大葱一层，以次递铺至半锅为度，用醋、酒各一成，酱油半成，香油（即麻油）四分之一，盐少许，和而浸之，将锅置细火上炙之，至汤尽为止，骨酥味美，过酒下饭均宜。”

1914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了《世界年鉴》（这是第二本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年鉴，1913版年鉴为第一本），该书由时任总统袁世凯题词，国务总理熊希龄作序，张謇书端。作为有关世

界概况的工具书，该年鉴对于民初国人了解国内外各方面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，也为我们留下了“酥鲫鱼”制作技艺的发展过程：在清代及以前用的是大鲫鱼，可能考虑到小鲫鱼的肉质较嫩，或是更容易达到酥的效果，最晚在清末民初时就开始改用小鲫鱼，并选用传统炊具砂锅烹制。再从此后各个时期的情况看，烹制“酥鲫鱼”的主料便都是鲜活的小鲫鱼了。

纵观饮食历史，“酥鲫鱼”由来已久。探寻其烹调原理，是利用米醋中所含的醋酸、黄酒中所含的乙醇在长时间加热的条件下，使鱼体所含钙质分解，鱼骨酥化。因此，制作此菜的米醋和黄酒，用量很多，滴水不加，加热时间很长。这种烧法，正是口味偏好清淡、不太喜欢油腻辛辣食物的南通农家菜最显著的特征。

据《中国名菜谱（江苏风味）》等书，“酥鲫鱼”制作技术由南通传至扬州等地，这一美味从此成为大江南北的佳肴，后被京沪等地各大饭店引入，还常被用以招待贵宾。史料显示，二十世纪三十

年代，上海的“酥鲫鱼”烹制以汉口路的小有天、北四川路的中天及三马路广西路北的消闲别墅三家最为擅长。1949年10月1日晚，中南海怀仁堂，“酥鲫鱼”曾荣登“开国第一宴”的餐桌。又据《尼克松传》等书记载，1972年2月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在接待宴会“菜单上列着中国最美味的菜肴：冷盆（松花蛋、酥鲫鱼和其他佳品）、竹荪芙蓉汤”等。

俗话说“慢工出细活”，经过长时间烹制的“酥鲫鱼”成菜后，鱼体红亮完美、筷搛不碎，而鱼骨酥透，无鲠无渣，入口即化，鱼肉却甚耐咀嚼。烹制时以作料代水，鱼味不失，酥香中透有微甜，食用方便，钙质丰富，既是理想的老幼食品，又是佐酒美肴。南通特一级烹调师吉祥和生前制作此菜最为得法，但这已经是上世纪的事情了。

不知是因为生活节奏的加快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如今的南通餐桌，早已不见“酥鲫鱼”的身影，但作为本地历史最为悠久、曾被袁枚录入《随园食单》并点赞的一道名菜，确是一份不该被遗忘并值得保护与传承的饮食文化遗产。

解放前南通的饮食业

□王士明

南通烹饪历史悠久，唐时，即有文蛤、鳓鱼出產。宋代，烹饪技艺就有独到之处，“酥鲫鱼”名传各地。明代，名医陈实功用糕点制作技艺创制的“八珍糕”保健食品流传全国。清末，实业兴起，经济发展，商贾云集，市场繁荣，饮食服务业名菜名点随之发展。民国初，南通的饮食业颇具规模，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。20世纪40年代，物价飞涨，饮食业发展缓慢。一直到解放前夕，从旧社会传下来下来的饮食店，大多规模小、设备简陋，卫生条件也差。

南通的文蛤、海蜇、鱼类等水产及

猪、禽资源，为地方饮食业烹调名菜提供了条件。清末民初，镇、扬帮名厨及京、津、宁饮食商人纷至沓来，饮食业颇具规模。是时，南通城区较大的菜馆有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的集贤楼及真月楼、聚宾馆、常兴馆、美味轩等。1921年，张謇于西公园北侧创办俱乐部，内设餐厅、旅馆，由刘铭余、焦星山等名厨掌勺烹调特色菜肴。1924年东牛肉巷开大华楼，1925年西牛肉巷万宜楼菜馆开业。1926年，南新市场开设开口西餐馆，为南通西餐厅之始。1928年濠南路口开设中华园京苏菜馆。这些店各具特

色，迎合消费，相互竞争。由于设施、技艺之别，中华园菜馆服务对象以军政界人物为主，大华楼则以工商界人士居多。1945年元旦，广式菜馆品珍酒家开业。先后开业的菜馆还有通济林、聚源楼、金门、竹林、李桂记、鸿记等。民国初年，西点、小吃、饮食店和摊点云集市区，其中，规模较大、且有名气的店，有万盛园、爱国春、四长春、大盛园、四和春等，这些店的店主以扬州籍居多，店处临街闹市，日夜供应。有些店虽小，地处后街，因特色而闻名，如五步桥金复兴点心店供应的葱花、五仁、洗沙、

通崇海泰总商会的建立与改组

□吴昊翔

清末民初，以张謇为代表的南通地方绅商和社会精英，积极推进地方各项社会事业，成绩斐然。这些成就的背后，离不开通崇海泰总商会的参与。通崇海泰总商会作为清末民初江苏四大商会之一，不仅对南通近代化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，还积极参与全国商会的联合活动，革除商业弊端、保护商人权益。

通崇海泰总商会的建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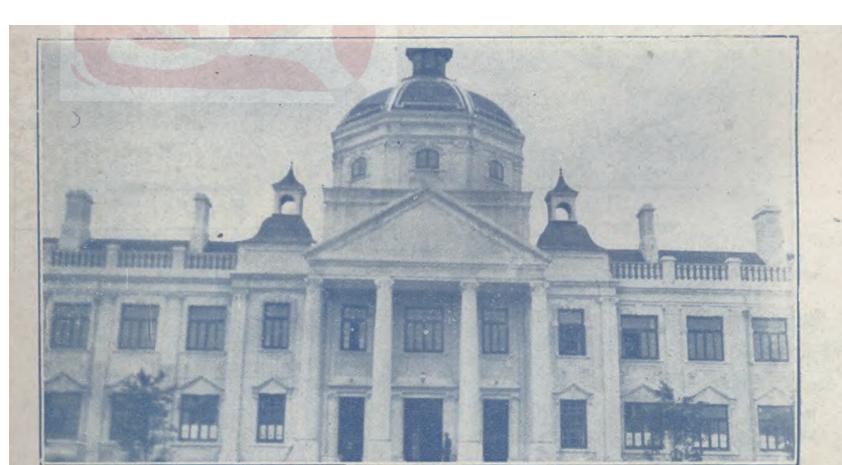
清末新政，直接推动了各地商会的建立。1903年，清政府设立商部，不久便颁布《奏定商会简明章程》，根据这一章程的规定，全国各地出现成立商会的热潮。通崇海泰总商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。

大生纱厂建成投产以后，带动了通州海门一带的棉花、土布业的发展。由于“该处地广数百里，花业而商业渐多，近自天生港作商埠，江轮往来停泊，商务日盛，且与江宁、上海两总会相距遥远，亟宜因势利导，准其设改商务总会，俾得互相联络，共收辅车之益”。1910年，经农工商部批准，原先的“通崇海商务总会”改名为“通崇海泰商务总会”（亦称“通崇海泰总商会”），其范围遍及通州、海门、如皋、崇明、泰县、泰兴、东台等处，会员多达数万人，职能包括联络工商、调查商情、受理商事纠纷、保护工商业利益等。

通崇海泰总商会不仅开展商业活动，“为四邑之商启其利，除其患”，还积极参与南通地方上的政治、军事、教育、慈善、水利、市政等事业，“邑中凡举大事，应变故、筹巨款，壹是以商会为总枢”。

通崇海泰总商会新楼的落成

“通崇海泰商务总会”成立时的会址设在柳家巷，因房屋较少，每次开会，人满为患。1920年，会长张謇筹集资金，并选定城南模范马路更俗剧场附近为新会址。同年冬天开始动工，1921年秋落成。所有房屋仿照西洋最新式图建筑，由通籍著名建筑设计师孙支夏设计，建筑面积数十亩，建筑费用约20万元。总商会新大楼包括可容纳千人的会议厅、



办公室、会客室、餐厅等百余间，系当时城内“规模最大的建筑物”。

1922年元旦，通崇海泰总商会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。1922年1月4日的《申报》的一篇报道记载了典礼的主要过程：

通崇海泰总商会于本日（一月四日）上午十时行新会所落成礼，张灯悬彩，辉煌夺目。（一）奏乐。（二）升旗。（三）会长暨会董、职员向国旗行三鞠躬礼。（四）张正伟会长（退庵）宣布开会词，略谓“本总会由通崇海泰四属商业同人公共组织而成，所抱之目的，为发达实业，巩固金融，以求于东亚商场之中，谋最后竞争之胜利也……”云云。（五）孙君锦章报告建筑账略。（六）名界致颂词。张镇守使（通海守使张仁奎）代表苏督齐燮元致颂词，瞿县长（瞿鸿宾）代表苏省长王瑚致颂词，许珏身代表四县商界致颂词。（七）

来宾演说。张孝若略谓“本会建筑之闳壮，布置之完整，实为全国商会之冠……南通地方，为中外所注意，所产花纱布之类，尤居重要位置，则对于经济上所负之责任，自与他县不同，必如何活动金融而使之巩固，必如何发展企业而使之充实……”（八）张退庵向来宾答谢。（九）全体与会门摄影，摄影以后，公共聚餐，主客酬酢，佐以军乐，颇觉尽欢，至十二时散会。

张謇、张孝若叔侄二人的演讲中均提及发展实业、巩固金融，在东亚商业竞争中夺取胜利，体现了他们的“商战”理念和总商会建立的宗旨。总商会大楼建成后，曾被用作诸多会议的会场，见证了近代南通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。

如今，通崇海泰总商会大楼成为濠河畔少数保留完好的民国建筑之一，收录于《中国建筑史》等文献，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通崇海泰总商会的改组

1927年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，国民党运用“党规”与“国法”，对民众团体进行了系统整理与重建。1929年8月，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《商会法》，要求各地原有商会自法令公布之日起，在6个月内进行改组。通崇海泰总商会的改组便是按照新《商会法》进行的。

1927年11月，通崇海泰总商会职员因任期届满，计划改选。1928年2月，总商会已经建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，选举张孝若等二十一人为临时执行委员，开始办理总商会改组事宜。6月，总商会拟定《暂行章程》。1929年9月20日，经江苏省政府建设厅同意，准予改选，总商会遂于24日开选举大会，10月16日，总商会举行执行委员第一届常会，互选常务委员七人。11月7日，总商会召开第一次常务委员会，“互选主席委员，徐赓起当选”，然而，由于徐赓起辞职不就，而后再次改选，成纯一当选。至此，通崇海泰总商会已形成新的领导机构，加快了改组步伐。

改组工作是在1930年全面展开的。1930年2月7日，通崇海泰总商会发布消息称“奉工商部令，不得以通崇海泰为区域，并不得再用总商会名称，刻召集执行委员会，依法改组”。年底，通崇海泰总商会宣布，因“与新商会法不合，经省指导员指导改组南通县商会，即日办理结束，准备撤销”。次年1月，通崇海泰总商会正式撤销，后成立南通县商会。

综上所述，通崇海泰总商会成立于晚清新政时期，撤销于国民政府时期，先后历二十余年。这二十余年中，通崇海泰总商会在南通地方实业、教育、慈善及社会事业等历史事件进展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，不愧为南通“一邑之总枢”。

“首善之镇”唐闸

□嘉玺

张謇在唐闸引进近代工业文明，创办了大生纱厂、广生油厂、复新面粉厂、资生铁冶厂、阜生蚕桑染织公司、大达公电机器公司等企业，不仅给南通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，而且给后人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公益慈善文化财富。说唐闸是江海平原“首善之镇”毫不夸张。

将唐闸（唐闸）说成是民国时期江海平原的“首善之镇”是恰如其分的。我们可将民国早期张謇时代唐闸的公益慈善事业列举如下：

新育婴堂：原南通育婴堂位于老城厢育婴堂巷，至光绪末年，老城厢育婴堂巷已显得十分破旧，且地势低洼积水，房屋多为坐东朝西或坐西朝东，阳光照射少，通风性能差。1903年，张謇、张謇兄弟陪知州王敬藏去育婴堂视察。三人不忍坐视，张謇决定另选地点建立新的育婴堂。1904年，张謇等人另择唐闸通济鱼池港北隙地建设新堂，1906年堂成，占地面积24亩，建筑皆系新式洋房，内设幼稚园和国民初等小学堂。初期，育婴堂入幼稚园幼儿68人，此举为全国首创。

建设大生职工工房：大生纱厂动工兴建时，在厂基地陶家坝的港北沿岸盖起了一排排简陋的芦棚茅屋。一大帮贫穷的外来建筑工人成为工棚的首批住户。工厂落成，纱厂开机，工棚又转而成为纱厂工人的临时住宅。1906年，张謇等决定在放工桥北面建设职工工房，解决职工的食宿问题。职工工房包括中式砖木结构两层楼房，共4排，每排12开间；单层平房2排，每排12开间。楼房每开间为一单元，内有楼梯上下相通，楼上睡人，楼下起居烧煮。职工工房的建成，解决了纱厂工人的住行问题。

唐闸公园：1913年南通诞生了最早的工人公园——唐闸公园，供大生纱厂工人静憩、休闲。

建设大生娱乐室：1914年大生纱厂建设大生娱乐室，娱乐室有台球、象棋等设备设施，供纱厂职工娱乐、休闲。

大生职工医院：由于唐闸到城区有一定距离，职工看病就医不甚方便，1914年张謇等决定创办大生职工医院，以便职工看病就医、住院治疗等。现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就是大生职工医院。

河东大操场：1920年大生集团征地，在通扬河东岸建设河东大操场，供实业警卫团、南通私立实业敬孺中学、唐闸私立实验小学操练之用。

南憩亭、北憩亭：1920年前后，阜生蚕桑染织公司在通扬河西岸建设南憩亭、北憩亭，为职工上下班途中提供“憩息”。憩息亭，外表青砖黛瓦、四面龙形翘角，颇具传统建筑特色。

沙元炳伪作三种

□彭伟

清末翰林沙元炳，集实业家、教育家、诗文家、藏书家于一身，又因其传世书作不多，故而受到收藏者喜爱。名声在外，又有利可图，沙元炳伪作不可避免。近年来，笔者就前后三次遇到沙元炳伪作。

初遇沙元炳伪作是在书网上见到一册手抄本《国朝科场舞弊案》。书末有“沙元炳款”朱砂题跋：……本朝有心术不正、翰林低劣之生，各寻途径以贿行路主考、监考等。诸官在钱眼面前，乱了方寸，半推半就或来者不拒。此已传闻多年，今读此文，凿凿实例也。光绪二十年四月即皋桑元炳记此。

初看跋文，书法普通，有些笔画粗劣，谈不上精美，不像进士墨宝。细读跋语，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沙元炳高中进士，此时关注科场舞弊旧案，似乎合情合理。不过此时还未有“五四运动”（推广白话文），跋语中居然出现了典型的白话文“诸官在钱眼面前，乱了方寸”等语。即便沙元炳晚年，新文化运动兴起，沙翁仍坚持用文言文写诗写文，《志颐堂诗文集》（沙翁遗著）及彼时报刊，所刊沙翁诗文均为文言文作品。笔者搜寻沙翁遗作多年，从未见过他的白话文作品。以此可推一，即便白话小说古已有之，沙元炳怎么会用白话文题跋呢？

再遇沙元炳伪作是两三年前的事。彼时《沙元炳》纪录片正在拍摄，沙元炳正为皋桑元炳所知。某日，有位戴姓古董商，知我研读沙翁历史，便请我去他在护城河边的古董店。那里有一幅沙元炳的竖轴书法，印象中写的是小楷《朱子家训》。字迹抄得清秀，索价仅2000元，我便拍照请吴香洲老师鉴定。他回复我：认真读下落款，落款中出现了“了”字的白话文，显然这又是一幅沙元炳伪作。

第三次，用篆为沙元炳自用花笺，上印朱文印：健庵，录有《癸未九口翁偕烈卿、辅之、保之至如皋为予作生日，赋诗见赠，依韵奉酬》，落款“专请啬翁同岁教之，元炳”。翻阅民国本《志颐堂诗文集》，此诗名为《九日啬翁偕烈卿、辅之、保之至如皋为予作生日，赋诗见赠，依韵奉酬》。仅仅一题，诗稿就有两处讹误，据《志颐堂诗文集》诗作排序，此诗写于癸亥（1923年），而非癸未（1883年）。沙元炳生号为小重阳，即重阳（九日）后一日。故有张謇率友于九日（非九口）来如皋，为沙元炳贺寿。癸未年，沙元炳虚龄20，尚未结识张謇，何来祝寿之说？再比对诗文，又有讹误，如“甘菊”写为“廿菊”。我对诗稿的真伪，表示怀疑，又向南通赵鹏老师请益。他对张謇、沙元炳墨迹十分熟悉，即刻回复：“沙元炳的字要比这好得多”，又言刘保之彼时还未出生，诗稿是伪作。

另一份四张，录有《解陈翁嘲》数首诗作，落款为“劬翁”。令人不解的是其中一题《过狼山望海楼，口上人……》，《志颐堂诗文集》作“愿持上人”。上人大名是沙翁熟悉的，何故不写名字，留下空白。又有项本源作《先师沙翁先生事略》，写明：沙元炳“晚岁别号劬翁”。劬、码两字，读音意义不同，劬更非码的异体字。沙翁进士出身，饱读之士，博学之才，即便暮年体弱，也不至于将别号也别字。细细重观七张诗稿，花笺旧墨迹，利用老笺仿作，是造假者惯用的伎俩。

沙元炳伪作屡屡现身，固然不好，藏家、文史研究者需要提高警惕，